

巴金赠书给茅盾

——兼谈早期《子夜》德译本的缺陷

林传祥



▲ 1979年3月巴金到北京看望茅盾

翻阅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李岫编选的《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读到“概述”里的一段话:“1938年德文版《子夜》序言,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德译者弗朗茨·库恩根据1933年开明版,改书名为《黄昏的上海》,在德累斯顿出版了德文版《子夜》全译本。这个德译本在我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无馆藏,现在见到的这个版本是巴金同志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后送给茅盾同志的,书的扉页上有‘送给雁冰先生’字样,我们应该感谢巴金同志为我们保存了这份难得的史料。”

读完这段话,不由得要问,巴金是什么时候购得此书的?为何巴金要送书给茅盾?

“意外”的译本

众所周知,巴金是作家,也是编辑家、翻译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藏书家。巴金嗜书如命,从年轻时起就养成了买书、藏书的习惯。20世纪50~60年代“文革”前,老上海的古旧市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里看书购书,惬意至极。他购书极为讲究,目标对象多为现代文学珍品和外文书刊。这本德译版的《子夜》——《黄昏的上海》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购得的。

巴金购书,除了自己珍藏之外,也会赠送与人。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书是给人看的,有了好书就是要让大家分享。当时作家之间似乎形成一种默契,好书不分彼此,相互赠送交流,在巴金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中就包括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等许多友人,自然也包括了茅盾,如20世纪50年代茅盾赠送巴金的十卷本《茅盾文集》签名本。

巴金赠书茅盾,除了“默契”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茅盾的敬重,在他的心底,他一直是将茅盾视为“先生”和“老师”。发现这本德文版的《子夜》,巴金的反应当然是惊喜又意外,而茅盾呢,接受巴金的赠书,料想同样也是如此。

搜寻相关资料,茅盾从未谈及过这个译本。40年后的1978年又有一个新的译本《子夜》出版,译者沃尔夫冈·顾彬,也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茅盾为其写了一篇短文《致德国读者》,里面也只字未提40年前的这个译本。按说,茅盾可以稍微“借题

发挥”一下,但他没有这么做。可能是因为茅盾本人对这个译本的陌生,并且从中发现了什么?碍于他是被译介的作者,所以不作任何表示。

这个“意外”还真真是个意外,果然是译本出了“问题”,想必巴金也看出了,赠送茅盾,显然是出于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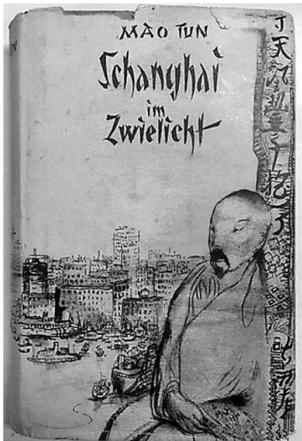
译本的“问题”

那么这本让巴金、茅盾都感觉“意外”的译本,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出在哪?

库恩在1938年5月的德文版《〈子夜〉前记》里有一段文字:“德文本《子夜》是欧洲第一个译本,也是包括十九章在内的整个原作的完整译本,只有在书的开头部分,由于编辑的原因,删去了大约10页偏重经济理论探讨的场面,这一部分的译稿存放于出版社档案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时查阅。”同时,他还写道:“1930年是蒋介石及其夫人于1934年发动‘新生活’改革运动的前四年。这部小说描写的事态,也许有助于这个重要的革新运动的建立。”

译本从一开始就陷入“问题”的泥沼。为什么要删去开头部分“经济理论的闲谈场面”,当然绝非库恩所说的“编辑的原因”那么简单。这一部分是作家借吴老太爷之死,有意安排的一个特定场景,将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提取出来,通过他们的“闲谈”,带来各路的消息,目的在于为以后各章节的展开铺设线索。这是一种巧妙设计,更是一种逻辑代入,将其删去,当然拆解了原书的构架。库恩完全无视这种“闲谈”背后的联系。

《子夜》新译本的译者沃尔夫冈·顾彬就曾直接指出:“他(指



德译本《子夜》 Shanghai im Zwielicht, 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也可翻译成“黄昏的上海”,译者: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

库恩)常常以创造性的才能,大段大段地对原书加以概述或总结,并进行章节方面的移植和调动,甚至拟出“各章节的标题,以及可以帮助读者领略全书概貌的,置于各章之前的人物表。”这种改动损害了原书格局,从形式上讲变得不伦不类。

有瑕疵但珍贵的译本

不仅如此,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因素以及库恩对这部作品理解的局限性(或曰指导思想),译本的思想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将吴荪甫的发展民族工业与1934年蒋介石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牵扯在一起,认为吴荪甫最后败走,心中仍装着对未来“新

生活”的憧憬(暗指蒋介石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说,“《子夜》所寓意的‘黎明的曙光’非结尾处所暗示的中国工农红军汹涌澎湃、日益壮大的力量。同时又因为“二战”前后纳粹时代的缘故,书中的某些革命者形象也被改变了面目,成了“苏俄特务”分子,一些关系到工人罢工斗争的场面也被作了技术上的处理变化。种种这些,可以说伤筋动骨,失去了原味。”

库恩如此毫无顾忌地删削修改,不说的译作面目全非,至少也是“伤痕累累”,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已故学者叶子铭先生1982年在他的一篇书话文章里提到在美国见到的泛滥的中国盗版书(其中包括茅盾作品)。但新译本作者顾彬又解释,认为似乎只有这样,译本“才能在纳粹时代获得出版许可”。这位新译本的作者顾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力求自己的译作不犯同样错误,更逼近于原作或更忠实于原作。真是“前车之鉴”,“时代”决定译作“命运”。

弗朗茨·库恩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翻译过《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注重在表达且符合本国读者阅读需求。他自称,“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他的这本译作。只可惜这本译作是残缺的、有瑕疵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它又是珍贵的,因为它第一次向西方国家介绍和展示了茅盾的这部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开拓工作。”

当然译本的出现,巴金功不可没。茅盾的“缄默”,更可以理解。现在这个译本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内。

(作者系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胡适给毕业生赠言

张雨

1929年,胡适以校长身份给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生的赠言是:“不要抛弃学问”。因为毕业后不受功课的约束,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部分是为了一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为之,毕业后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研究。同时警告毕业生,趁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一定要做一门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退时,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为时已晚了。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的。胡适的谆谆教诲,没有泛泛空论,而是贴切实用,很接地气,至今仍不失教育意义,给人颇多启迪。

1932年,胡适为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3种药方。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鼓励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虽然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但仍要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有了

问题,才能保持求学问的热心,才不会把业余时间白白浪费掉。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个:“总得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职业未必是你所学习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因此,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的业余活动。很多时候,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要重要。胡适举了19世纪英国哲人斯宾塞的例子。斯宾塞是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思想界的一个巨擘。由此看来,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

第三个方子还是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绣花针”。胡适鼓励毕业生,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他的毕业赠言给人以精神暗示,成为无数个青年的精神食粮。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陶亢德的编辑观

金颂

编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名刊的陶亢德,对于编辑一道颇有心得,称其为编辑家,大约算不得过誉。他写过一本回忆录《陶庵回忆录》,虽不以谈编务为要,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他的编辑观。

诀窍之一,就是对写稿者恭敬殷勤,来稿能用的马上通知,不能用的立刻退还。对于未成名的作者,则采取先宽后严法。初次来稿,凡有一二可取处,如文字好、构思好,则尽量予以刊登。但若第二篇来稿不及第一篇出色,马上退还,绝不降格以求,也不再约稿。这个编辑方针的好处,是可以鼓励有才华者继续写作,不至于初出手就被冷淡,从此无意动笔。

编《论语》时,因刊物拖欠作者稿费,陶亢德为此专门找时代图书印刷公司经营人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以及邵洵美索要。在他看来,作者是衣食父母,稿费不仅不应该拖欠,还应从丰才是。后来编《宇宙风》,郭沫若7000字的《由日本回来了》索价100元,合1000字15元,虽然稿费标准有些高,他却一口应允,一手交钱一

手交货。在编辑《宇宙风》的时候,陶亢德曾策划过几个特辑,他所最得意的是《自传之一章》。参与者除作家郭沫若、茅盾外,还有各界名人如冯玉祥、陈独秀、蔡元培等,都是一时之选,其中却夹杂着一位香港舞女李丽。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之约李丽写自传,实在是想,像她这样的人,很可能有些特殊的经历,未尝不可以供读者一爽胃口。”

陶亢德取悦读者并不是低级地迎合读者。他说,一个刊物要编得好,编者心里必须有一个主意,若只想迎合读者,必定劳而无功。他还分析邹韬奋《生活》和美国《读者文摘》成功的原因,是“由于编辑者的精神思想与大众者的精神思想正相契合,他俩不是‘迎合读者’获得读者,而是以其合乎‘迎合于民心的内容使读者‘一拥而上’”。

陶亢德还有一个特殊的编辑习惯,就是很重视作者字的好坏,对于名家固然不会凭字取舍来稿,对于普通投稿者却往往以字取文。不过,这一条在以电脑代笔的今天,现代的编辑是无法施行了。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闻捷的边塞诗“三部曲”

王荣 王抒滢

现代著名诗人闻捷在新疆的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吐鲁番情歌》等诗作。1956年,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出版,向读者展现了天山南北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表现了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的生活、精神面貌和理想追求。《天山牧歌》是新中国首部描写边疆人民生活的诗集,以其鲜明的特色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被誉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

1957年,闻捷参与筹组中国作协甘肃分会,1958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1958年5月,朱德到甘肃视察时,闻捷以《甘肃日报》记者的身份随行采访。在甘肃期间,闻捷创作了抒情组诗《河西走廊》。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这是根据新疆

解放初期解放军平息巴里坤地区乌斯满匪帮大规模武装叛乱的真实事件创作的,一部长达万余行的叙事长诗。闻捷“通过这首长诗,记载了解放初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人从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历史过程,记载了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反动派的幻想和末路”。《复仇的火焰》结构宏伟,反映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生活,通篇安排了多条相互交织的线索,被评论界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

从闻捷的叙事长诗里面可以看到哈萨克阿肯弹唱、维吾尔达斯坦、蒙古史诗的印记,可以看出他向兄弟民族文化传统学习与借鉴的真诚态度。

《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河西走廊》是闻捷诗歌代表作品的“三部曲”。闻捷也从一名新闻记者成长为与贺敬之、李季、郭小川齐名的诗人,被誉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边疆新生活的歌歌手”。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沙叶新做客

周星

1986年,当代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和他同学古剑先生一起到常州拜访高晓声。虽然那时候高晓声在社会上声望已经很高了,但是他热情待人的态度让沙叶新感觉非常温暖。晚上,高晓声亲自下厨,做了一些地道的常州菜,准备和两位客人一醉方休。经过一番东说西说,已经临近午夜,他盛情邀请沙叶新和古剑留宿在他家。高晓声在常州桃园新村住的房子是公房,条件一般,但对于长期住在农村的高晓声而言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自己住在大房间,地上还铺了条高档的地毯。只是过于脏乱,本是红色的地毯已经发黑了,还很潮湿,人走在上面就像踩着又黑又湿的海绵。

看到这些,沙叶新实在无法忍受

了。当晚,他在主客安睡后,就趁着夜深人静、月黑风高之际,独自一人在高晓声家中悄悄地掀起了一场“爱国卫生革命运动”。沙叶新先清洗厕所,用铲刮冲刷的方式让厕所环境焕然一新;接着又将客厅中当晚吃的果皮纸屑和烟头彻底清扫干净;最后拖地、擦桌椅、洗门窗。沙叶新的这一番动静惊动了古剑,他也加入到了卫生清洗运动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两人终于把高晓声家里打扫干净了。

第二天早上,高晓声看到家中被打扫得这么干净,很是惊讶。当看到沙叶新和古剑笑眯眯地看着他时,顿时明白了。于是,他笑着对两人说:“我家被子还没有洗,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哈!”说完,三个人大笑起来。

汉语拼音的领路人

梁水源

摘自胡为哉?

1874年,卢懋章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文。1879年回厦门后,寓居鼓浪屿内厝澳。因他既会厦门话,又懂英文,所以“西人习厦话,华人习英文,均奉以为师”。在鼓浪屿,他应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的聘请,帮助翻译《华英字典》。彼时,外侮内患,国难当头,这激发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爱国的思想。卢懋章注意到4亿中国人80%以上是文盲,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离,平民读书识字困难重重的现实。于是,他更坚定音字改革的决心,益发猛进不懈。为了实践改革汉字的宏愿,他致力于研究漳泉十五音和话音字,于1892年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书中拟定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提出了“语言一律”的思想。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后,卢懋

章在鼓浪屿乌礁角和厦门二十四崎脚召集船工、小贩开班教学。他为了鼓励大家习字,还通过考试给予奖赏。实践证明,学习这种切音字,只需半年时间就能简单写作。一时十分风行,连外国人来学的也不少,都称赞简便易学。由于他热心推行,“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舌以诱之”。事实上,卢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创造性地采用了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卢懋章的大胆尝试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广泛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8年,时在工部局任职的安溪人林榕存上书,请求将卢懋章的字学新书颁行天下。光绪皇帝钦批“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懋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但因戊戌政变被耽搁。1905年,卢懋章把经过修订重写的《中国切音新字》专程送到北京,请求推行。但学部与外

1854年12月,卢懋章出生于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他自幼聪颖,9岁入学,18岁参加科举,县考名列前茅,府试却落第,从此不入科场。卢懋章在邻村英埭头执教时,恰逢“西学东渐”,受西方文化影响尤深,故与科举制度进一步决裂。他说:“求学期于济世,寻章